

文章编号 :1000-2278(2013)04-0502-03

景德镇近当代陶瓷艺术变迁史之张松茂访谈录 (1949年~1976年)

方李莉

(中国艺术研究院,北京 100029)

一 写在前面的话

对于景德镇近代陶瓷艺术发展史来说,景德镇的一位陶瓷艺术大师,一位陶瓷手艺人,一位陶瓷艺术家,就是一座亲历过景德镇半个多世纪的图书馆。二十年以前,笔者曾记录过许多景德镇手艺人对民国时期的回忆,但今天当我再次回到景德镇,发现当年我采访过的老艺人,大都已烟消云散。如果没有那些记录,不仅没有我完成的《景德镇民窑》、《传统与变迁——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》、《飘逝的古镇——瓷城旧话》三部著作,而且许多的往事和历史也就被永远遮蔽了。所以,我决定再次到景德镇做口述史,这次的口述史,重点是放在1949年至今。在这段历史中景德镇经历了从手工业作坊到合作化,到国营工厂的计划经济,又到如今的手工艺的恢复与复兴。这一历史阶段的亲历者们如今也已进入晚年,经历过1949年景德镇陶瓷手工作坊走向合作化道路的艺人,大都已经80岁以上。而且这次考察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景德镇近代陶瓷艺术史,这段历史是从民国开始的。

在民国之前,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们创造了许多的陶瓷日用品,也可以称之为陶瓷艺术品。但这些工匠们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一个艺术家的地位,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匠,在所有的陶瓷品上从未有过工匠的名字。而从民国开始,在外来机械生产的挑战下,工匠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,他们力图以艺术的创作来拯救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。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匠们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群体,已形成一种力量,来对景德镇的未来发展造成影响,如当时的珠山八友就是这样一股社会力量。他们不仅画瓷器,还注意文化修养,将当时国画等姐妹引进到陶瓷艺术中,并在每件作品

上签自己的名字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景德镇有了陶瓷名家,或称陶瓷美术家,将工匠提升到艺术家,将他们做的陶瓷作品提升为艺术品。这一影响延续至今,只是今天有了更好听的名字,叫陶瓷艺术大师或工艺美术大师。为了记录这段历史的发展与延续,笔者考察了景德镇民国时期的工匠艺术史。又找到当年珠山八友之后,或他们的徒弟做访谈录,试图记录在他们之后的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史。

在这篇访谈录中,笔者的访谈对象是张松茂大师,他是景德镇第一批上陶瓷美术师的人,也是第一批上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的人,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,而且他出生于陶瓷世家,又是珠山八友刘雨岑的徒弟,他的夫人徐亚凤既是陶瓷美术界的名人,也是珠山八友之后,所以对他的访谈非常重要,而且这样的访谈必须抓紧。近期我带着学生去拜访他,他已79岁,身体还很好,但耳朵有点背了。我还陆续的拜访了40余位景德镇年迈的陶瓷艺术家,计划还要做更多的访谈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。

录音经过原始整理后,笔者又根据内容做了先后次序以及逻辑上的调整,使其更加完整化,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。希望这样的访谈发表后,会引起更多的人们关注景德镇近当代的陶瓷艺术发展史。

二 访谈录

方李莉(以下简称方):张老师您是景德镇的陶瓷世家,又是国家级大师,我们希望您能谈谈您的从艺人生,从您最早学艺开始谈,谢谢!

张松茂(以下简称张):小时候我跟着我的父亲学

收稿日期 2013-10-12

艺,他的专长是填瓷器,当时他是帮刘雨岑填瓷器。由于父亲的机缘我接触到了刘雨岑,开始他叫我天天到他那去打扫卫生,沏茶、磨墨等。他每天早上都要画画,所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他磨墨,磨久了就要换新鲜的墨水。我开始是学习画图案,并帮刘雨岑画图案,画完后,他还会给点钱我,这样,我一方面随他学艺,另一方面也帮他做点力所能及的活。我当时好勤奋,怎么个勤奋呢?刘雨岑叫我去画图案,我就帮他磨墨,磨完了我就说:“刘老师,准备工作弄完了,你去画画吧。”于是我就去看他画画,这个我不客气的,边看边手指沾着水在毛衣上画。后来开始在盘子上画,一次被刘雨岑看到了,他感叹道:“画得真好,跟真的一样!”就在这种情况下,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我从来没拜过师,但刘雨岑就是我的师傅。

1949年解放了,当时景德镇陶瓷业搞合作化运动,把一些著名的艺人们都集中到一起,办了许多个陶瓷合作社,我也进了其中一个合作社。那时候我才16岁,虽然年轻,但绘画的基本功已经很不错,不仅能画传统粉彩花鸟、人物。还会将西洋风格的油画,临摹在瓷板上,当时我临摹了一张“列宁在1918”的油画在瓷板上,见到的人都说,这小孩怎么画得这么好呢?画中的列宁就像真的一样。当时初解放,大家在政治上有顾虑,好多老艺人就叫我不画世界名人,画不好,是要挨批的。我年纪轻也不懂那么多,那时候有个从部队下来的赵政委来到景德镇担任市委书记,他很关心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,经常到合作社来,他就像合作社的负责人一样的。他几乎每天上午九点多钟就要到一些合作社走一走,他就看到我画的“列宁在1918”这幅油画,就说:“这个小孩怎么这么聪明,画得这么好。”这时我心里就放下一块石头了,心想:“你政委都说我画得好,画得像,肯定没问题。”我就一直画下去了,在当时有点小名气。画列宁、斯大林、莫洛托夫这些人都画得很像。就这样得到了整个业界的认可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,有一些景德镇的名家都要归队,聚在一起,当时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陶瓷工艺美术社,工艺社比合作社高一层,像刘雨岑、王大凡等都在工艺社,我们这些人就在合作社。后来经过发展,景德镇就成立了一个陶瓷研究所,把全市的老艺人,像珠山八友这些制瓷制得好的都集中到了里面。像我们这一辈人都没法进研究所的,我的父亲都没法进

去,非得要有名气的,有名望的人才能进陶瓷研究所,就像当时的刘雨岑、王大凡、王步等这样一些人才能进去,

我画了“列宁在1918”之后,有点小名气,赵政委说这个小鬼硬要拿到陶研所锻炼锻炼,把他培养出来,他有这个天赋,所以,我是破格进陶研所的。解放初,国家需要制作国家领导人的用瓷,开国大典瓷,还有外交部用的礼品瓷等,这些国家领导人用瓷,庆典瓷、国礼磁,要求都很高,大部分是在陶瓷研究所完成的,当时我虽然年轻,但经常被破格参加设计,而我也因此有机会得到锻炼。在陶瓷研究所有许多名人,他们带了好多学生。我比刘雨岑这些人名人地位低一点,但是比学生高一点。加上我的政治条件好,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,所以说是这些条件把我培养上去的,加上我自己也很努力。比如,景德镇画瓷器的传统,是从临摹师傅的或街上买的画谱开始的,没有画写生的传统。我也一样,以前没有画过写生,解放后,受陶瓷学院和外来艺术的影响,我开始学习写生。陶研所那时候要种花、种草,我就对着那些花草画。最早画写生,是王锡良提的,我就跟着王锡良结伴到处走。画花鸟,也画山水。别人重视我,我自己也努力嘛。

小的时候,家里穷的不得了,所以,我只读了两年半的书。到了上世纪50年代,我调到陶研所,有机会接触许多知识分子,包括大学老师,比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键鹰教授,我是好早就和他很熟,他那时候还没有来陶研所,他和刘雨岑这群人接触,但当时我只是给他们烧水、泡茶、磨墨的角色。只能是他们作画,我很用心的在看。他是接受新式教育的,和刘雨岑的画法又不同,所以在我的学习过程中,不仅有景德镇的传统,也有机会接受到外来的新的教育,这种情况之下,加上我有这种的天赋,进步当然很快。我很勤奋,一天画到晚,除画画外,我也学习书法,还学诗词,这都是画画需要的。特别是长恨歌,真写得很好。有些好的唐诗,我都能背下来。如长恨歌:“汉皇重色思倾国,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杨家有女初长成,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,一朝选在君王侧。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民国时期,景德镇那些有名的陶瓷艺人,虽然读书不多,但都很注意提高文化修养,因为画瓷器不仅要画画,还要配诗,写字。刘雨岑就常跟我说:“要学东西,除了学画画还要学文化,没有文化是

不行的。”所以我就每天读唐诗、宋词，还练书法，读书。学诗、书、画、字、印这些东西，那是我天天要学的，我天天写一张毛笔字，拿草纸写，再买一些图章来自己刻印，这都是画上的需要。解放以后，受学院派的影响，我迷恋上了写生，一到了礼拜天，我就要出去写生，如景德镇的莲花塘，那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

方：据说您的大哥张松涛也是景德镇的名人，您能说说您的大哥吗？

张：他是老大，我是老三，他比我大7、8岁，他的艺术头脑比我的好，但是他又太聪明了，除在艺术上有才能之外，他还有另外一种才能，他会组织人。以前景德镇画瓷器的都是分散在一家一家的红店里，然后大家都说，我们成立一个合作社多好啊，合作社成立以后，我大哥就当上了合作社的主任。于是，他开始从政，景德镇的艺术瓷厂是他一手办起来的，赵政委也重视他，认为他不错。然后，到了文革以后，形式有点改变，后来年轻的人，差不多都来攻击他，攻的他好难过。他就和我说，老弟啊，还是你走得对，我不该从政，应该搞专业。其实他画画的天赋比我高，他很会画东西，但很可惜，他没有发挥这方面的才能。他从政，后台没有人，很艰难，文革批斗，他受不了，他死了后，我哭得很伤心，我是跟着他长大的，我的妈妈死得早，我爸爸要去刘雨岑那做事，只有哥哥成天带着我。

方：上世纪50年代景德镇陶瓷彩绘最有名的有那些人？

张：景德镇陶瓷彩绘分工很细，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小有名气的的人，有填色的，画图案的，画人物、画山水的、画翎毛、画花卉的，还有画粉彩、古彩、青花的等等。就拿我们家来说，像我爸爸是填瓷器的，我是画人物的，我哥哥是画花鸟的，写字还要请别人来写。一般来讲，填瓷器、画图案、写字的都属于配角。最出名的还是画瓷器的，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刘雨岑、王大凡，王小凡等那些老一辈的珠山八友以及他们的下一代，如王锡良也有点名气，因为王大凡是他的叔叔。

方：那王步呢？

张：王步是画青花的，他的青花是最有名的。民国时期，刘雨岑、王大凡等珠山八友，再加上王步等几个搞釉下彩的，振兴了景德镇，那个时候就这一群人起作用，让景德镇有了一点生机。当时的国民党也重视文艺界的人，一般新上任的市长或其他重要的政府官

员，到景德镇后都要首先拜访珠山八友等当地陶瓷美术名家，还常常找他们画画、画瓷器，然后作为礼品往上送，那时候的官场讲究送礼。

方：你是怎么认识学院派的教授，又是如何与他们交往的？

张：解放初时国家要做建国瓷，还有外交部的礼品瓷等，当时一些瓷器的造型和画面都是中央美院的教授设计的，他们有时会来到陶研所和我们一起工作。所以我认识他们，如梅键鹰、高庄、祝大年等我们都很熟悉。与景德镇陶瓷学院老师的交往是我曾被聘到陶瓷学院给学生们上课。解放初时，景德镇陶瓷学院还没有成立。国民党时期，景德镇有一个陶业学堂，解放后，那里的老师走的走，老的老了，为了重建学校，就向社会招聘老师，以前的老艺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没有敢应聘。第一届的校长是当时的文化局长，他把我请去教学，那我就很胆大，他叫我去我就去，我做事很急，赶夜备课做准备。我还是有一定基础，以前在美术合作社也教过学，在这一方面我有一点经验，我知道这种画瓷器的一些基本理论。当时教画画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法，就是写生，我重视写生，一直坚持写生，与我当时的教学也有关系。

后来学校从中央美院、中央工艺美院、浙江美院、广东美院调来了一些老师，他们会画画，但是对瓷器一点都不懂。我第一次去那里讲课，我告诉学生这个纸画和瓷画不同，瓷画的颜色看起来是粉色的，烧起来是碧绿色的，洋红在瓷上就用水带一下就可以了，和豆沙一样，洋红上去了是一粒一粒的。玛瑙红比洋红黑一点等等。当时有人说我是工人讲师，我心里就有点不太服。为什么不服呢？我不仅到陶瓷学院讲过课，还到浙江美院，中央工艺美院讲过课。后来讲课多了，也讲得有一定水平，别人就不说我是工人讲师了。

方：你文革的时候受过冲击吗？

张：没有，文革时单位一直让我搞宣传，宣传毛泽东的思想，画毛主席像，后来又去井冈山写生，画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的壁画。当时也有人批斗我，但是斗不了，我是受保护的，因为工作需要我。

采访人与终稿整理：方李莉（简称方）

受访人：张松茂（简称张）

前期录音整理：张欣怡

日期：2013年7月24号